

# 新昌文脉对县域发展的影响

吕永春

新昌历史悠久,人文荟萃,文脉绵长。当前,新昌正奋勇行进在“小县六大”出新出彩、“七个攻坚”图强争先的新征程上,探析新昌文脉对新昌发展的影响,对于积极探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,打造新时代文化新昌具有重要意义。

## 一、循背景之迹,溯新昌文脉之“源”

新昌文脉是特定历史时期、特定文化背景下,由区域文明繁衍辐射而形成。

1. 社会背景为新昌文脉形成提供了转机。社会背景是文化发展的土壤和条件。两汉之前,黄河中下游地区,一直是政治、经济中心,经济、农业、手工业发展很快。到了魏晋南北朝,北方军阀割据,战乱不断,不少百姓南迁,中原人口逐步与江南人口融合,促进了南方的经济发展,经济中心也开始慢慢南移。特别西晋末,因北方民族南下引发“永嘉南渡”,大批士大夫避乱渡江,晋室在建康(南京)建立东晋,政治中心也开始南移,有了劳动力和先进生产技术的南方经济突飞猛进。经济的发展,为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基础,刻东开始脱离相对封闭状态,区域文明开始萌芽。

2. 文化背景为新昌文脉形成提供了时机。魏晋时期是社会的大动荡时期,也是民族的大融合时期,更是思想的大活跃时期。两汉经学的僵化和集权政治的削弱,使得原有的经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。再加上社会动荡,意识控制弱化,一定程度上摧毁了原有的文化枷锁,社会层面思想变得活跃,传统的儒学独尊局面遭到破坏,文化发展也相对繁荣,各个学说层出不穷,儒学、道教、佛教多种思想并存,一些士大夫和文化人士提出了新的思想和观念,特别是玄学的兴起,对儒家、道家、佛家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随着晋室南渡,中原文化也逐步融入南方地区,带动了包括刻东在内的南方文明的发展。

3. 区域背景为新昌文脉形成提供了良机。据史学大师陈寅恪考证,琅琊王司马睿率百族南迁后,门阀士族多在建康首都作政治活动,至于殖产兴利、开发经济则在会稽、临海之间。原因就是建康近旁的义兴、吴郡、吴兴等产粮富庶地带早已被南方士著世家占有,除一些重臣被皇帝赐田于钟山附近外,其余南渡士族只能渡过钱塘江,向会稽郡属各县“求田问舍”,以谋求经济之发展。故此会稽山一带也是北来上层社会阶级居住之地,聚集着大批名士高僧,形成“今之会稽,昔之关中”的盛况。正是在这样区域文明的影响下,刻东冠盖往来,名流云集,众多历史人物留下了活动足迹,刻东文化发展迎来了良机。

## 二、循演进之迹,悉新昌文脉之“络”

东汉以前,新昌文化相对落后,真正有文献记载和史迹可考的是东汉永平年间(58—75)刘阮遇仙故事(刘义庆《幽明录》)。以此为起点,区域文化逐步萌芽,演进轨迹十分清晰,即从佛教文化,再到唐诗文化,尔后来韵文化勃兴,继而红色文化兴起,最终构成源远流长、独具特色、多元一体、传承至今的新昌文脉,造就了新昌独具辨识度的文化形态。

1. 佛教文化。形成于魏晋时期,对后世影响甚大。魏晋时期,由于各族统治者的提倡,使佛教有了肥沃的土壤,得到显著的发展。正是在这个时期,刻东佛教文化光彩夺目,一时成为南方佛教中心。新昌佛教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,可以分为三个阶段:第一阶段是西晋中后期,是佛教文化的萌发期。西晋太康十年(289),西域僧人幽闲在澄潭横联村立新建寺,即现在的兴善寺,这也是绍兴最早的寺院。民国《重修浙江通志稿》称之为“浙江佛教先声”。这说明当时刻东已与佛教有了接触,但尚处在扩散时期,影响是极其有限的。第二阶段是东晋,是佛教文化的扩散期。咸康间(335—342),竺道潜居东东山建东岳寺。永和间(345—365),支遁于沃洲小岭立寺行道(后于石城建栖光寺),竺法友建法华台寺,昙光来石城建隐岳寺(大佛寺前身),于法兰在隐岳西侧创元化寺(今千佛禅院)。般若学“六家七宗”中,除“本无宗”外,其余“六家六宗”的创立者,几乎同时聚于刻东,造就十八高僧胜会沃洲的盛况,佛教文化发展十分繁荣。纵观在刻东活动的高僧,他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与政局变动息息相关,当统治阶级信佛近佛时,他们就活跃于京师,往来于王室名流之中,致力于宣扬佛法,争取统治阶级对佛教的认可。当政策转变之际,他们就隐栖刻东,潜心著书解经。朝廷对待佛教的态度对于佛教在中土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。东晋时新昌佛教突然大放异彩,就是这个契机造

成的。第三个阶段是南朝,是佛教文化的兴盛期。南朝宋、齐、梁、陈各代帝王大都提倡和崇奉佛教,佛教传播和建设更是惊人,刻东也迎来了第二次的建寺高潮。宋元嘉中(424—453),就有九峰寺、云居寺、方广寺、南岩寺等。齐永明年间(483—493),开凿石城、元化两处石窟。南北朝时期,刻地共四十个乡共建佛寺32所,其中刻东十三乡建寺14所,以三分之一的土地,建寺近半,可见刻东佛教文化之盛。

新昌佛教文化在南朝达到鼎盛后,在历朝历代都有发展,寺庙有所增多,但声势和影响力均不如魏晋南北朝,哪怕隋唐时期佛教鼎盛时,刻东佛教文化依然不如南北朝。明万历时,新昌有寺26所,清末则有34所。佛教在刻东的传播和流行,留下了深刻影响。一是奠定了佛教中国化重要发祥地之一的地位。在刻东活动的支遁等高僧,带领僧徒对原始佛教义理进行研究解构,翻译和整理了大量佛教经典,并撰写了许多佛学著作,发展了佛教思想,也使外来的佛教在传播中开始走上中国化的道路。二是留下了一流的艺术成果。作为佛教徒供奉和礼拜的对象,佛像艺术的发展和流行,基本上是伴随着新昌佛教文化的兴衰而兴衰。石城寺石窟弥勒造像和千佛造像,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,具有非常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。三是构筑了新昌人文精神的底色。佛教传入县境在新昌历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,通过中国化教义的推广,满足了普通民众的信仰心理需要,教化功能日益明显,成为新昌早期人文精神的重要内核。

2. 唐诗文化。主要形成于隋唐。刻东是“十八名士”和“十八高僧”胜会之地,天人、时空事、释儒道等文化发展的所有要素,都在刻东得到独特滋养、有机融合、个性发展,盛况空前的唐诗文化由此而生。据统计,《全唐诗》有作者2000余人,其中到过刻东的有278人,占了13%;《唐才子传》收录作者173人,62%的咏诗与刻中,刻东相关,可见当时县境文化之盛,堪称浙东文化中心。唐代诗人们游历刻东原因,主要有三个方面:一是朝圣而来。刻东人文渊薮,王羲之隐居、谢灵运开道等名士流风遗韵影响深远。唐代知识分子大多崇尚仙佛,出于对魏晋遗风的追慕,纷纷到刻东朝圣。以《全唐诗》和《中国历代名人辞典》为准,涉及《沃洲山禅院》“十八名士”的诗篇228篇,其中戴逵占42%,王羲之25%,孙绰8%,涉及“十八高僧”的诗篇727篇,其中支道林占85%,竺道潜15%,南朝102篇,谢灵运占总诗篇的72%,隋32篇,智者占72%。如刘长卿“沃洲能共隐,不用道林钱”,刘禹锡“一旦扬眉望沃洲,自言王谢许同游”等,足见唐代诗人对魏晋遗风的仰慕。二是慕名而来。盛唐时来刻东的诗人俱名重一时,有较大的影响力,他们对刻东文化底蕴和山水风光极尽赞美之词,使刻山刻溪成为当时的一种文化符号,自然引起当时其他诗人对刻东的向往,他们纷至沓来,所思所想所慕也充分反映在唐诗中。如朱放“月在沃洲山上,人归剡县溪边”等。如赵嘏“南岩气爽横郭郭,天姥云晴拂寺楼。”温庭筠“茶炉天姥客,棋席剡溪僧”等。三是游历而来。除了朝圣而来,慕名而来,还有一批诗人就是单纯地游历而来,简单地讲就是路过而已。从唐代各时期诗人入浙行踪及所留诗作看,刻东是唐朝诗人游历浙东的中心点,自钱塘江渡江抵越州萧山县(今杭州市萧山区),再从西陵(今西兴镇)渡口进入浙东运河到达越州(今浙江绍兴),然后沿越中名水剡溪上溯,经刻东,到达天台山。

唐诗文化带给新昌虽然没有多少物理意义上的遗存遗迹,但其意义和影响不可小觑。一是为山水注入了灵性。大量来刻东游历隐逸的文人,审美情绪安逸自得、豪迈豁达,为刻东山水注入了灵性、魅力与精神,留下了璀璨多元的人文风景,提升了新昌山水风光的人文内涵。二是为城市赋予了诗意。唐朝诗人们把新昌的自然地理和文化资源以“诗歌”为纽带串接在了一起,滋养了新昌的地域文化,赋予了新昌区别于其他城市的“诗意”的文化特质。三是为发展开辟了通道。这条游历路线改变了传统区域文化发展、交流的空间格局,促进了区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,先进文化不断通过这条游历路线而广泛传播。1988年,竺岳兵首次把这条游历路线称为“剡溪唐诗之路”,1993年正式命名为“浙东唐诗之路”。

3. 宋韵文化。主要形成于两宋,历经元、明、清各朝,绵延不绝。新昌宋韵文化,实质就是理学文化,本质上就是兴学育才,重视教育、重视教化。新昌宋韵文化有三

个显著特点:一是教育普及。教育机构蓬勃发展,崇文重教蔚然成风,形成了官学为主、义塾为辅的教育体系,再后来书院兴起,各个阶层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。官方有县学。宋太平兴国中(976—984),张公良“立县治,建邑庠”。庆历五年(1045)下诏天下州县立学校,“建学兴善,以尊士大夫之行”,新昌建立县学。绍兴十四年(1141),林安宅“首以兴学为急”,鉴于“基址湫隘”,改迁县学于书案山麓。明洪武初,还曾出现过私学,每里1所,共42所,选民间俊秀子弟入学,聘年高有德的儒者为师。民间有私塾。民间办学之风盛行,最早的私塾是宋咸平二年(999)建于石溪村的石溪义塾,并聘请程明道为师,大的家族也基本建有私塾。除了县学和义塾外,还有书院。宋嘉祐初(1056),石亚之筑室读于鼓山,称石鼓书堂,这是绍兴境内甚至浙江境内创办较早的著名书院。宋嘉泰三年(1203),陈祖创建桂山西塾,绍兴四年(1231),陈雷继承从祖遗业建桂山东塾,明嘉庆间,邑绅吕周维、妻陈太恭人独捐资建鼓山书院,乾隆辛未(1751),邑令曹磐建南明书院。清光绪二年(1876),西乡绅何维贤、黄琼、俞桂书等捐资创建沃西书院。及至晚清,私塾遍及乡里。民国36年(1947),尚存改良私塾10所。二是文风昌盛。自宋代始新昌就弥漫着学术之风,程朱理学、陆王心理,新昌人都有深入的研究,文风昌盛是前所未有的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,南宋建都临安后,新昌当时是各派学说的汇聚之地,当时名儒相聚瓯(永嘉)、婺(永康),绍兴处于中间枢纽地位,儒家代表性人物在新昌活动交往较为频繁,朱熹、陈亮、陈傅良、叶适等南宋四位名儒与新昌石塾、黄度、俞浙等三位大儒交往密切,甚至一度在新昌任教,促进了新昌教育的普及和发达,对新昌地方文化发展和人才培养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。三是科第绵延。“新昌为浙东小邑,而科第得人为最盛”。北宋期间,新昌有进士42人,到了南宋,新昌进士人数更多,达到70人,再加上补遗14人,两宋近三百年,共有进士126人,仅次于会稽县,占到绍兴618人的四分之一,其时新昌人口只占十五分之一,可见新昌科第之盛。元朝时,新昌进士3人,全绍兴24人。明朝建立后,宋韵文化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,进士36人,这是继南宋以后以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又一高峰。

新昌理学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一是文化的觉醒。新昌宋代之前的文化,更多的是属于外来文化,但宋韵文化的形成,则主要是依靠新昌本地人而形成的,是本地文化的自我觉醒,对后世影响深远。二是士人的崛起。义塾大兴,理学昌明,通过科第制度走上仕途的人越来越多了,进士群体、举人群体开始形成,本地开始出现大量人才。两宋举人55名,明朝有举人89人,岁贡180人,再加贡举补遗10人,荐辟39人,清朝有进士11人,举人68人,岁贡184人,新昌人成为新昌发展的中坚力量,推动了新昌发展。三是教泽的传承。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教育,如宋朝知县王世杰“德之不修,学之不讲,是吾忧”,钱宏祖“此推崇教化之本”,元朝县尹完颜从忠“兴学乃令分内事”,明朝知县曹天宪“斯文之首务”,清朝徐日曜“计无逾于此者。民间士绅也十分重视教育,山区小县文化气息日益深厚,使新昌集聚了强大的人文力量。

4. 红色文化。红色文化形成于民国初期至新中国成立。五四运动时,新昌就燃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烈火,一批批热血青年和仁人志士投身于火热的斗争之中。1922年冬,梁柏台加入中国共产党,成为我国建党早期党员。1927年2月,中共新昌独立支部成立,领导开展工农革命运动,支援北伐战争。在土地革命风暴中,爆发了震惊全省的张万成农民暴动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新昌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,建立抗日武装和抗日民主政权,创立嵯新奉抗日根据地,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前哨阵地。1945年9月底,抗日战争胜利后,中共嵯新奉中心县委、嵯新奉县办事处的干部和武装,奉命随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山东解放区。1948年,先后建立了嵯新奉、嵯新东、新天3个县工委,开辟了嵯新奉、嵯新东、新天3块游击区。1949年1月,浙东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近千人在新昌回山会师。5月18日,中共新昌县临时工作委员会、新昌县人民政府、新昌县大队在回山村宣布成立,指定了各区负责人。5月22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21军61师挺进新昌县城,新昌迎来了解放。这个历史时期,自救自强是新昌文化的主旋律。

一批批热血青年和仁人志士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列,打破了封建文化对新昌人民思想的禁锢,更为马克思主义在新昌的传播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。随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,红色文化不断壮大,军民无畏的革命精神、不屈的民族意志充分展现,成为新昌文脉灵魂所在。

## 三、循影响之迹,彰新昌文脉之“力”

千百年来,新昌逐步由“南明之小邑”,发展成“东浙之名区”,新昌文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### (一)以文化人,铸就了人文精神的底色

1. 从精神传承讲,新昌人守正道、性温和。新昌人大多温和善良,普遍带有一种坚守正道、敦厚淡泊的性格,待人接物至真至诚。成化《新昌县志》称:“风俗淳庞而人才杰特”。万历《新昌县志》称:“独其俗淳厚”。这种求真向善的精神传承,一代一代影响着新昌人,并成为家家家训的重要内容。如被誉为“清官第一”的甄完,曾亲自订立甄氏祖训,涉及持身勤苦、力学尊师、立业进取、守法秉正、淡泊戒贪、敦睦为善等26则。但也应该承认,这种向善的人文精神也一定程度形成了新昌人缺少竞争的性格。

2. 从精神支柱讲,新昌人肯吃苦、敢担当。新昌自古就是蛮荒之地,资源少,条件差,人民生活十分困苦。“无渔盐舟楫之利,财赋岁入不及上县十之一二”。这种恶劣的自然生存条件,并没有挫伤新昌人的锐气,反而养成了新昌人肯吃苦、敢担当、实干事、善创业的地域品格。县志载:民耐劳苦,勤耕读,尚礼文,节衣缩食而弦诵相闻。在这种务实创业精神的影响下,新昌较早得到了开发,人口慢慢聚集,由宋大中祥符四年(1011)有23000户,47767丁,到嘉定元年(1208)有28820户,77572口。近百年时间,人口增加了62%。后来也是凭着新昌人勤劳的双手,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征服自然、治穷图强的华美乐章。到1791年,全县人口增至21731户,共127506人。新昌解放后,新昌发展更是突飞猛进,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。

3. 从精神因子讲,新昌人不守旧、敢尝试。古代新昌虽然地处偏僻,但并不闭塞落后,反而十分开放。自东晋中原士大夫南迁,把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到了新昌,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互相融合提升,形成了新昌文化兼容并收、博采众长、开放创新的特质。这种敢于尝试、开放创新的精神对新昌发展影响深刻。唐宋时期,新昌就有造纸、丝绸纺织、制茶、酿酒等手工制作加工业,所产剡溪月面松纹纸、竹纸、棉纸负有盛名。清代中叶以后,这种精神促使了近代工商业的萌芽,1724年开办了朱永兴铁铺,1769年开办了两家纸厂和茧灶,1841年开办了章萃丰酒坊等手工企业。新昌解放后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后,这种影响愈加突出,促使新昌形成了体制上的先发优势。进入21世纪,又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高潮,综合实力显著提升。

### (二)以文载道,造就了社会和谐的底蕴

1. 孕育了崇文重教、耕读传家的社会风尚。新昌人勤学好、敬人才。新昌素来非常敬才惜才,重视人才,重视教育的风气绵延不绝,传承至今。万历《新昌县志》载:先民之流风善教犹有存焉,故于东南为望邑。康熙《新昌县志》说:特其地多闻人,为孝友、为节义、为理学,经济文章,代不绝书。崇文重教的传统陶冶了无数才华卓越之士,成就了新昌众多官宦书香世家,出了许多知名的人物。他们在不同社会时期不同工作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,树立了新昌人的标杆形象,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新昌人把这种风气传承下去。1979自恢复高考以来,到2020年,有160多名学生考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,其中北大87人,清华46人。有中国工程院院士3人。

2. 滋育了救亡图存、自强不息的社会风骨。古代新昌,地广人稀,山深林密,交通不便,长期封闭。但随着建县后经济的发展,新昌逐渐成为交通要塞,“东通台温,东南明州,西南婺州,西接剡及郡,往来咽喉”,历代军事活动频繁,饱受战乱之苦。“徽宗宣和庚子,方腊起为乱,入邑焚民居殆尽”,“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二月,寇寇杨震龙入邑,焚官舍民居略尽。”“明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冬,倭寇九十余人入邑,焚民居,吏民逃窜。”等史载不绝,可谓“鼎革之变,动辄有事”,新昌人民遭受了巨大痛苦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,一批忠义之士挺身而出,如“元朝元将伯颜南侵,陈非熊率家人集义勇千余,力战而死。”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东乡西山村民和县城商界立即组织“志愿义勇军”,还有后来的梁柏台以身许国、英勇

牺牲等,这些充分展示了新昌人救亡图强、自强不息的凛然气节和社会风骨。

3. 哺育了自力更生、团结奋斗的社会风气。新昌在绍兴八府中,建制最晚,又是最僻,“壤地小而赋寡”。在这块美丽而贫瘠的土地上,新昌先民胼手胝足,自力更生,团结奋斗。县志载:百尺梯田,农人耕于天际;鸟道盘桓,岭路通向山巅。这种社会风气支撑着新昌一步步走向昌盛。宋朝等次为“紧”县(为望、紧、上、中、下,3000户以上为紧),元代为“中”县(分上、中、下三等,2000户以上为中),明代为“望县”,清代为“三等县”。新昌解放后,这种社会风气引领下,新昌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,走出了一条从科技强到产业优、生态好的发展新路,2001年成为全国百强县,2023年在全国县域综合竞争力位列第52位。

### (三)以文图强,筑就了千年发展的底座

建县以来,新昌文脉在三个阶段起到了关键作用,助推新昌驶上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。

1. 新昌置县到两宋时期。随着唐宋和两宋之际大量衣冠南渡,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和技术,江南平原地区得到了高度开发,不少新耕地被开发出来,农田的开辟增加了粮食的供应,也促进了人口的增长。两宋时期江南水利建设得到高度重视,农业耕作技术获得迅速发展,亩产量大幅提高,农民生活较为稳定,地方经济实力大大增强。山区小县迎来了文化发展的高峰,为新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精神土壤。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人口开始集聚,教化渐见推行,偏僻山区逐步得到开发。两宋时期,新昌的可耕地多已开发,接近20万亩,元至元二十七年,田亩超过了22万亩。明万历六年,田地山塘加起来达到30万亩,此后基本稳定在30万亩左右。

2. 清中期到民国初期。文化的兴起和繁荣,吸引了更多的人向新昌集聚,迎来了近代工商业的萌芽,为新昌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。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近代工商业开始萌芽,工场手工业开始起步。随着人口的增多,工商业也逐步发展起来,特别是到了清代中叶,新昌工业开始萌芽,催生了一批手工作坊。到清末民初,全县共兴办各类手工作坊191家,涉及到铜、锡、铁、木、竹、印刷、成衣、酿酒、银楼等21个行业。民国时期,近代工商业零星发展,工业有碾米、织布、制茶、缫丝、发电等数十家,商号近千,并形成了烟、茶、丝、术等四大传统产业。到1934年,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约4000万元。这些手工作坊和近代工商业的发展,奠定了新昌工业基础。

3. 建国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,新昌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高潮,综合实力显著提升。第一个阶段是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。解放后,经过几个时期建设,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并不断发展,建成了丝厂、轴承厂、制药厂、丝织厂、毛巾厂、水泥厂等一批企业,完成了长诏水库、自来水厂、电力公司、新昌大桥等一批基础设施工程,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的工业体系,县城面积有所扩大。到1979年,工业比重首次超过农业,工农业总产值达1.8亿元。第二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。改革开放后,工业经济快速发展,国民经济驶入快车道。1984年,新昌率先在企业中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和“工效挂钩”制度,实行“放水养鱼”政策,形成了体制上的先发优势。1993年,新昌又启动了新一轮的改革,成为当时全省国有企业改革典型,形成了国企改革的“新昌经验”和“新昌现象”。1995年前后,新昌紧紧围绕中央提出的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要求,抓住科技创新的机遇,形成了科技上的先发优势。第三个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。党的十八大以来,县委县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团结带领全县上下,坚定走好“工业立县、生态兴县、创新强县”发展路径,绘就出化茧成蝶、繁荣昌盛的壮美画卷,核心竞争力、对外知名度、发展均衡性迈上了新的台阶。

一个地方的发展,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,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。悠久深厚、意韵丰富的新昌文脉,是历史赐予新昌的宝贵财富。全县上下要坚定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,敬畏历史、敬畏文化、敬畏生态,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积极探索,保护和传承好历史文脉,加快建设新时代文化新昌,推动新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。

(作者系县史志研究室主任)